

# 进外交部担任周总理和毛主席的翻译

## 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二) 2



万隆会议会场

甚欢。

我比大永年长一两岁。各走各的路。我们又提及上述入党的对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人各有志，勉强不得。他对我如愿成为中共党员表示欣慰。而他自己一直坚持以马共身份努力工作，直至退休。谈完，彼此会心一笑。他的表情一直珍藏在我的脑海里。

在使馆，我被安排担任政务参赞的印尼文翻译。万隆亚非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搬进大使馆住。周总理在大使馆举行告别招待会，苏加诺总统应邀出席。

这是苏加诺总统历史上第一次出席在外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因此保安工作格外严密。

招待会开始前一两个小时，印尼外交部和总统府的礼宾官员就到大使馆来视察。当我把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尔佐(Sukardjo)引到大堂时，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穿着便装，手摇一把黑扇，从大堂后门走了进来，与印尼大使邂逅。当时我在场，便主动充当他们的翻译。因为不是正式会见，前后不到10分钟，谈话便结束。陈老总回房间换衣服去了。

事后，使馆有关领导向我了解当时的情况。未加褒贬，但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从他询问的口气，我隐约感觉到，此事办得不妥。当时我应该上向领导报告，让领导决定派翻译。

从此，我思想上明确了一条：在任何场合，特别是重大场合，翻译员都不应主动为某领导人当翻译，只能由组织委派。这是组织纪律问题。

另外，翻译员之间严禁

私下打听或交流翻译内容。周总理说，外交无小事，严守外交机密，是每个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都应无条件遵守的。

1966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亚非拉青年代表，外交部礼宾司派我到现场当翻译。会见完毕，毛主席和青年代表合影留念。

我和周总理外事秘书站在边上观看。许多年青翻译员争先恐后地挤上去合影。总理秘书见状，说道：“像你们这些老翻译比较懂规矩，绝不会争着合影。”我听了感触颇深。自觉遵守规章制度，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靠长期磨。当然，旁人及时点拨也很重要。

1964年11月，周总理与苏加诺总统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谈。我当的翻译。公谈结束，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为了写外事活动简报，特意到宾馆来找我，希望能从我这里了解会谈内容。

当时我没有接到任何授权，会谈内容绝不能向外泄露。对方老大不高兴。其实我很理解他的苦衷。外事简报如果只谈礼仪性的事，不涉及会谈内容，是没有什么看头的。他的要求有一定合理性。

但我想，如果他去找有关司长提出同样要求，也肯定无济于事。其结果只能是：小我服从大我，局部服从全局。

使馆工作很繁忙，但很磨练人。

头两年我在调研室。以后就调到大使办公室。主要搞对外联系、安排对外活动，翻译照会和各种外交文件以及口译。

大使馆直属单位有调研

室、办公室，附属单位有文化处、武官处、商务处。

我在大使馆工作期间，经历了不少重大事件：周总理率团参加万隆亚非会议、宋庆龄、郭沫若、刘少奇以及中国文化艺术团、中国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等访问印尼，还有为苏加诺总统治病的中国医疗小组。

这些事件在中印友好关系史上，都留下浓重的笔墨。

我十分珍惜在大使馆的经历。与同龄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历史让我有机会把自己的青春年华融入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去。

1957年国内开展“反右”运动，使馆不搞运动，只开展正面学习，即按部门分组，学习文件、听报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由党领导的政治学习，感觉很新鲜，充满热情。

使馆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领导分配我负责编辑简报工作。每天发一期，供各组交流传阅。对组织上的信任，我很感动。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当时头脑简单幼稚，以为凭我在报社当过副刊编辑的经验，编辑学习简报，应该是游刃有余。

岂料，刚发第一期，我就被当头棒喝。领导问我：这个大标题是谁提的？为什么没有经过审批就拿去打印？我回答说：标题是我根据简报内容提出的，没有与他人商讨；第二，我不知道简报打印前必须送审，这是我的错。

老实说，当时我对国内“反右”斗争的情况，知之甚少。我只想标题搞得生

动些、醒目些，鼓励大家对使馆工作多提改进意见。

我的所作所为，正应了庄子的一句老话：“初生牛犊不怕虎”。虽然我没有被撸下来，但它却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政治课。

“吃一堑，长一智。”我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学习结束时，开全馆总结大会，黄镇大使做了总结发言。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将军、老外交家，以一颗赤诚的心向全馆人员袒露胸臆，令人感动。黄大使非常感谢大家在学习期间对他本人和对使馆工作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他说，他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算短，但由于学习不够、觉悟不高、进步不快，缺点不少，希望在今后工作中，同志们不断地批评监督，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把工作做好。

谁都知道，黄镇出任驻印尼大使后，中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取得很大发展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表彰，但黄镇大使并没有因此而居功自傲，脱离群众，相反更加谦虚谨慎，更加深入群众。因而赢得全馆同志的崇敬和拥护。

这里必须浓重提一笔：黄镇大使和朱霖同志对我们这一批华侨干部关怀备至，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照顾，使我们长期在使馆工作，心情愉快，如鱼得水。

每次回北京述职，只要抽得出时间，大使夫妇或朱霖同志都会到外国语学院看望瑞玲，并关心她的学习情况。50年代末国内困难时期，朱霖建议我买一大盒饼干，让她带回去送给瑞玲。为了以后瑞玲能配合我的工作，朱霖向她建议，放弃俄语，改念英语。但因瑞玲舍不得放弃已经念完大学一年级的俄语，只好根据自己的意愿继续念下去。

我永远感谢黄镇大使夫妇对我的培养和信任。

直到今天，50年代曾在驻印尼使馆共事过的老同志，不管后来他们是否还在同一个单位，几乎年年都会有聚会，畅叙旧情，互道珍重。

每次聚会，餐馆老板和服务员都会向我们这批白发

苍苍的耄耋老人投来钦羡的眼光，或伸出大拇指赞誉我们之间50年代建立的友谊经久不衰，弥足珍贵。

50年代末，越南和蒙古各派外事工作组到雅加达，谋求同印尼建立外交关系。当时他们人生地不熟，又没有印尼文翻译，便向中国大使馆求援。黄镇大使表示，兄弟国家有困难，应该给予帮助。于是决定派我为他们提供咨询和服务。

虽说都是兄弟国家，依然需要注意内外有别。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心中要有数。

两国的主要代表，都是大使级外交官，中文说得很好。会见印尼外交部官员时，我就充当翻译。

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我们的合作也很愉快。

他们离开印尼前，黄大使还设宴款待。他们对中国大使馆的真诚帮助表示深切感谢，也对我个人表示谢意。

### 跨入外交部大红门

1963年6月，我结束了使馆八年半的生活和工作，调回北京，进入外交部。

北京和外交部都是我向往已久、梦寐以求的地方。

打理行李时，同志们都来向我话别。有个别同志还帮我捆扎行李。有位机要员在废纸堆里发现一大张公债券，他不无惊讶地问我：怎么，你连公债都不要了，这都是钱。每年到期你都可以到银行兑现。

这是50年代中，我花了1000元人民币认购的公债。当时以为支援国家建设，不应索取回报。后来补发的公债券，也没仔细看，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我很感谢这位机要员同志的提醒。

我所以有能力认购1000元的公债，原因是我调人大使馆头一年试用期，使馆按政策还给我发放报社2000多印尼盾的工资（按当时汇率：1元=2印尼盾）。我就是拿出一个月工资认购的。

我是乘飞机到香港，经罗湖，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的。同行的有调研室主任凌青、文化专员唐范宇、驻雅加达总领事馆翻译许源明。

我们在香港停留两天，